



站在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前沿

叫 响 “查海时代”

- 在中华文明探源视野下，“查海时代”正以其完整的早期聚落形态、成熟的玉器工艺与鲜明的龙图腾崇拜，勾勒出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图景。
- 这一概念的提出，不仅将辽西地区推至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前沿，更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辽宁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关键地位。
-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，查海遗址已不再是一处区域性遗存，而是解读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密码。

从采集陶片开始

查海的故事，始于陶片。

陶器是人类用火创造的第一种器具，一旦制造出来，就像年轮一样记录着人类文化的演进。1982年5月8日傍晚，阜新文物普查队员赵振生在查海村附近调查时发现沟底有一块陶片。他滑下两米深沟，擦去泥土，一片带有清晰手工痕迹和“之”字纹的陶罐残片显露真容。正是这块不起眼的陶片，拉开了查海遗址考古发掘的大幕。

从1987年到1994年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，考古人员在此进行了七次系统发掘，让这片沉睡于辽西大地的新石器早期聚落重见天日。

40年后，查海的故事有了更清晰的回响。在系统梳理全国早期遗址材料的基础上，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提出了“查海时代”这一重要概念。他将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这一阶段，明确划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关键发展期。

根据赵宾福的研究，查海遗址自身就跨越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早期的三个文化阶段：早期的小河西文化、中期的南台子文化、晚期的兴隆洼文化，时间纵贯约2000年。这意味着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先民们延续生活、持续创造了近2000年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全国同时期遗址中，查海是时间跨度最长、文化序列最完整、聚落规模最显著的遗址。据此，赵宾福将中国新石器时代重新划分为三个清晰的大阶段：查海时代（公元前7000年—公元前5000年）、仰韶时代（公元前5000年—公元前3000年）、龙山时代（公元前3000年—公元前

2000年）。

从时空框架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查海先民以其丰富的物质、文化创造走在了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前沿。而时空坐标的确立，也让我们得以深入观察，在这个漫长的“时代”里，先民们究竟构建了怎样的社会生活。

开启定居生活

查海先民在辽宁地区最早开启了定居生活。这意味着他们不再被动依赖自然的偶然馈赠，而是走向原野，建造村落，实现了文明进程中的重要跨越。

定居，首先体现在聚落的规划上。查海遗址发现的55座半地穴房址排列整齐，外围设有围沟，不仅划定了聚落范围，也可能具备初步的防御功能。稳定的居所，为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
定居更需要稳定的食物来源。遗址出土的2000余件石器中，石铲、石磨盘、磨棒等农具占相当比例，说明原始农业已成为经济支柱。石铲的束腰设计便于绑柄，适用于开垦与耕作；石磨盘上提取到的淀粉颗粒，则证实先民已掌握谷物加工技术。与此同时，渔猎工具依然精致，动物遗骨数量不少，反映出一种农业为主、渔猎补充的混合经济形态。

考古人员还发现了23处窖藏，有的内部留有柱洞，形似仓库。这说明当时已有余粮贮存，生产力达到了一定水平。

房屋的规模差异，则暗示了社会分化的萌芽。聚落中央的46号房址面积达120平方米，其中出土的大型石铲无使用痕迹，可能用于仪式活动。这或许表明，当时已出现了地位较高的首领或

公共议事场所，社会结构趋于复杂。

考古人员注意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：查海遗址没有发现一件骨器，这或许与当地土壤条件有关。若土质偏酸性，骨器便难以保存至今。这也提醒人们，考古解读需充分考虑埋藏环境的影响。

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初步的社会分化，如同肥沃的土壤，不仅滋养了基本的生存，更催生了更高层次的文化与精神追求。查海先民在物质生活之外，开始了对美的雕琢与对信仰的塑造。

强大精神标识

定居生活推动了手工艺与精神信仰的迅猛发展。

1991年，考古学家苏秉琦考察查海遗址后，提出“万年文明起步”的论断。他认为，查海玉器解决了三个问题：一是对玉材的认识，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，三是对玉的专用。“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，所以是文明起步。”

查海遗址共发现了44件玉器，均为透闪石、阳起石类的软玉，为真玉器。器型包括斧、凿、玦、匕等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指出，这些玉器不仅工艺成熟，还可能关联一条由外贝加尔湖到东北再沿海岸南下的玉器传播路线。更具精神象征意义的是那条堆塑石龙。1990年，考古人员在连续几个探方中发现人工堆砌的石带，整体清理后，一条长19.7米、宽约2米的石龙呈现眼前。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实地考察后，将其定名为“石堆塑龙”。这条查海先民堆塑的石龙已经在辽宁大地上存在了数千年。

实际上，龙的形象最早是在陶片上被辨认出来的。查海出土的陶器中，出

现了两类与龙相关的浮雕纹饰：一类是盘曲的龙身与上卷的龙尾，龙鳞整齐排列；另一类是在陶罐下部对称装饰的蟾蜍与“蛇衔蟾蜍”图案。陶器上的龙纹与地上的石龙相互呼应，印证着龙图腾早在8000年前就已萌芽，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强大精神标识。

然而，创造了如此璀璨早期文明的查海先民，最终却离开了这片家园。关注查海的学者至今仍在思考这个问题。遗址保存相当完整，未遭后代扰动，也未发现洪水、火灾等灾难痕迹。大量器物仍保留在原位，仿佛一次从容的告别。

无论原因是什么，是环境的变迁，还是对远方的向往？可以确定的是，先民们毅然离开了熟悉的土地，踏上了更具挑战性的全新旅程。

从聚落定居到玉礼初兴，从龙图腾萌生到文明起步，查海遗址清晰勾勒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复杂化的完整轨迹。它不再只是一个区域性遗存，而是解读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密码。叫响“查海时代”，正是对那段文明初曙岁月的有力召唤，也是对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前沿坐标的郑重确认。

词条

新石器时代

新石器时代是考古学上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，辽宁境内该阶段始自查海时代，终结于夏商之际，核心标志为磨制石器普及、陶器烧制成熟与定居聚落形成。因山海相间的地理特征，辽宁呈现农耕与渔猎、畜牧并重的地域特点，并发展出谱系完整的本土新石器文化，新乐、红山文化为其核心代表，是中国新石器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构成。

文化融合的生动“面孔”

布局：其中三个遗址位于近似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，应为生活居住区；贾家沟遗址位于三角形中心，地势不同，采集器物也明显有别，很可能是一处公共活动区域。

“这打破了以往只关注单个遗址的研究局限。”陈山表示，“它说明在8000年前，这里已经出现了有规划、有功能分区的社会组织形态。”

交融密码

文化融合的痕迹，不仅刻在石头上，也留在陶器中。他尺西沟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三种：直腹罐、鼓腹罐和曲腹罐。直腹罐与东北亚文化有联系，鼓腹罐具有渔猎文化特征，而曲腹罐则是前两者融合后的创新器型。

陈山解释：“曲腹罐的出现，正是文化深度交融的证明。”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再看2019年出土

的双面石雕神人面像，其意义就更加明晰。一面水波纹，象征着渔猎文化；一面图案有学者认为形似猫头鹰，可能融入了草原文化因素。这件石雕生动表明，新石器时代的辽西地区并非封闭之地，而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枢纽。

重要线索

查海遗址群，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。陈山团队还发现了可能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。这些精美的特殊器物，并非日常用品，很可能用于祭祀或身份标识。礼器出现，是社会产生等级分化、礼仪制度萌芽的标志。陈山认为，查海遗址群正处于从“万年文化史”向“五千多年文明史”过渡的关键阶段。“以往认为8000年是新石器时代的开端，而随着查海遗址群等一系列发现，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

的起始时间应该更早。”

这个遗址群保存了8000年前辽西地区的社会图景：这里不仅建立了有组织的聚落，还在文化交流中创造了新的物质与精神成果。一件双面石雕，诉说着文化融合的故事；一个遗址群，缓缓揭开了文明前夜的面纱。这些发现可以看到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在8000年前的辽西大地已悄然展开。

(本版稿件均转自《辽宁日报》)

